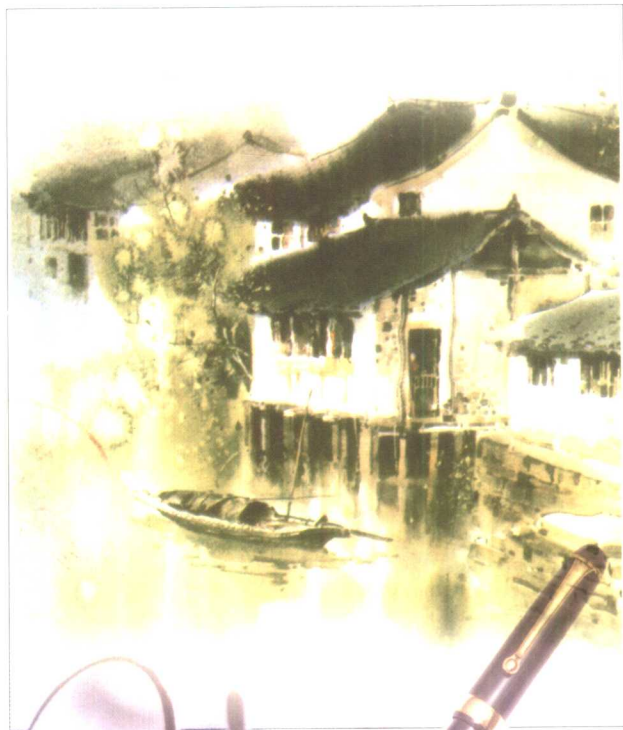


李继凯 著

鲁迅 与茅盾



河北人民出版社

鲁迅与茅盾

李继凯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6.25.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与茅盾/李继凯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12

ISBN 7-202-02852-2

I. 鲁… II. 李… III. ①鲁迅 (1881~1936) - 学术思想-研究②茅盾 (1896~1982) - 学术思想-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8843 号

书 名 鲁迅与茅盾

作 者 李继凯

责任编辑 李良元 王苏凤

美术编辑 马少华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71,000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202-02852-2/K·700

定 价 17.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部比较与外部比较

(代 序)

王富仁

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正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龙泉明先生就曾倡导过中国现代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那时他约了一批人，写了一批文章，编了一本书。我当时与查子安先生合写了一篇关于梁启超与鲁迅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比较文章。当然，在此前，像这样的比较研究文章也是有的，但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龙泉明先生的倡导颇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对于中外文学的比较，国际上有比较文学学会，是国际上承认的一种研究领域。有理论，有方法，有实践，有交流。但同一研究领域不同作家和作品的比较研究却没有这样的国际性的组织，也没有这样国际性的影响。不被承认作为一种固定的研究方法。但我想，两种比较研究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外的比较研究，解决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的问题，解决的是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的的问题。不论是法国的影响研究学派、美国的平行研究学派、前苏联的历史的比较研究学派，还是跨学科研究，起到的都是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艺术门类的文学艺术交融在一起的作用。用我的观念来说，都是构筑统一的“总体文学”的方式。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对我们是非常必要的，它反映着中国文学国际化的要求。但也有一些问题。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发展

水平还是极其有限的，从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就是接受多而输出少。中外比较文学搞来搞去，就主要搞成了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认真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种现象，对发展中国文学还是有推动作用的。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我们现当代的文学研究，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职业。在开始，大家都是有一种明确的意识的，即不论研究什么，无非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到它成了一个固定的研究部门，来搞这种研究的人多了，一种研究方式就直接被研究者接受过来了。到底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学科，这个研究领域的很多人未必意识到了，一种研究方式也就仅仅成了一种操作方式。在这时，文学的标准就在无形中外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更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产生与发展的。这种影响是接受，是以承认外国文学的标准为前提的，外国文学的标准就强化起来，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是纳入到外国文学的标准下被感受、被理解的。这就无形中压抑了原本脆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的研究者重视外国文学，我们也重视外国文学，我们中国文学的处境就悲惨起来了。这就像一种商品，外国人喜欢外国的，中国人也喜欢外国的，中国的商品就没有人买了。这里当然也有实际质量的问题，但也有在一种文化观念之下的文学盲视的问题。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就是这种文化观念产生的一个基地，一个渊藪。别的烟囱里不冒烟，只有这个烟囱里冒烟，人们吸的都是这个烟囱里冒出来的烟，久而久之，人们就闻惯这种烟了，有了别的烟，反而闻不习惯了，闻得习惯，也说不出口来了。大家都这样想，这样说，有点不同的感受也似乎不必说、不愿说了，说着反而感到别扭了。我曾经想，假若有人问，对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人，我说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斯特劳斯的解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或者说林毓生、李欧梵、夏志

清、司马长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只要对我不怀恶意的人，大概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我自己说着也很舒服。但我细想过这个问题之后，认为还是李何林先生普及鲁迅作品的主张、陈涌先生鲁迅小说研究的宏观性、樊骏先生提出的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命题，王德厚先生对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视，对我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更是根本的。可以说，它们是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四大支柱。当然，我们这些人那些大师级的人物可能有所不同。但到底是大师级的人物少，而我们这些没有“级”的人物多。把外来影响看大了，把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作用就看小了；把外国文学的影响看光荣了，把我们的文学对我们的影响就看耻辱了。时至今日，我们人人抱着一个外国的祖师爷，中国文学就被我们抱丢了。抱着的是越抱越热，丢了的是越丢越冷，到在鲁迅身上也感觉不到暖气了，成了“僵尸”。外国文学就无限大了起来，中国文学就无限小了起来。我们搞中外比较文学研究原本是为了发展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学的，现在反而成了我们自己文学的掘墓人，走向自己的反面了。

大凡一个民族对外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接受，都是以本民族的文化或文学为主体的。尽管我们吃的是窝窝头，外国人吃的是面包。但在我们没有造出面包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把窝窝头全部扔掉。扔掉了，我们好多人就没有吃的了，就要饿肚子了，有的人甚至会被饿死。而只要我们中国人还有很多人吃的是窝窝头，这个窝窝头与面包就有了对等的价值：它们都是维系我们国民生命的必需品。面包可以价格高一点，窝窝头的价格可以低一点，但你不能说窝窝头就一点价值也没有。而对于那些吃惯了窝窝头而不惯面包的人来说，尽管别人说面包多么好吃，窝窝头多么不好吃，他也仍有坚持吃窝窝头的理由。因为人与人的感觉原本就是不完全一样的。超于一切人具体感受之上的普遍标准不能说一点儿没有，但也是不

鲁迅与茅盾

多的。譬如说，在卡夫卡与鲁迅之间，卡夫卡就是洋面包，鲁迅就是本地产的窝窝头。前者不仅在外国有名，在中国也有名。多数人是认为卡夫卡比鲁迅更伟大的。但时至今日，我还是更喜欢鲁迅。卡夫卡也喜欢，但总觉得不如鲁迅那样更能入我心，入我脑，读起来像吃辣椒那样痛快刺激。我不能以我的感觉为绝对地对，但别人也无法说我的感觉就绝对地不对。人生经历不同，感受事物的角度不同，人们的观感也就会不同。以后可能还会有变化，但往哪里变也是说不清的。总之，中外的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学研究的坚实的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只有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研究来研究去，每个人都觉着自己的研究是公正的、合理的，也可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学研究丢了。

但在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好给人排座次。《水浒传》中的那些弟兄们，在没有上梁山以前，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大小上下的座次的，但一到了梁山上，就有了座次的问题。我们现当代的知识分子大都离开了官场，原本已经没有了明确的座次之分。但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是从学校里走出来的。从小学到大学，我们就被人家排来排去。谁是第一，全班“打头的”；谁是老末，“坐红椅子”的。好学生、坏学生，排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似乎不如此就无法说明一个人的价值和地位。虽然我们已毕业了，但这种看人的方式却也根深蒂固了。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研究还是重评价而不重欣赏分析，重名次而不重实际作用。整天为了谁在上谁在下而争论不休。实际上，我们的人不是压着摆生活的。各有各生存的空间，虽然不能说没有任何分别，但这种分别却不是绝对的。即使这种区别，也不是排座次排出来的，而是在整体的观照中观察出来的。譬如说，你要绘制北京地图，是无法把我住的这三间屋画出来的。但你的绘图却也不是把北京市的房子按照大小排了一个

队的结果，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小了的结果。我的房子虽然没有被明确画出来，但我的房子已经包括在这个地图中了。这和挑选全国“十大青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十大青年”并不包括你我，而整体观照的方式是所有的人都包括的。排队有一个看得起谁看不起谁的问题，而整体观照则没有这个问题。它是以相同的比例尺缩小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是这样。即使写文学史，也不是一个座次的问题，而是一个格局的问题。所以，这个格局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格局是空间性的，不是有了你就没有我的问题。讲小说，你得把郭沫若排在鲁迅之下；讲诗歌，你得把郭沫若排在鲁迅之上；在二三十年代，鲁迅在文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定的空间，到了40年代，就没有他的空间了。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的空间大一些，谁应占的小一些，是以他的文学创作的情况而定的，但不论一个作家占的空间多大，都压不着别人，因为别人在自己那个领域里是主人。而为了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格局弄得更合理，更精确，首要的问题不是分清谁伟大、谁不伟大的问题，而是弄清不同作家和作品彼此关系的问题。这样，内部的相互比较就是重要的了。我在当时，曾经想写一些连续性的文章，对各主要作家之间的关系做些比较。但除鲁迅与梁启超的比较之外，只写了鲁迅小说与茅盾小说、鲁迅小说与郁达夫小说的比较，后来便感到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要想对两个作家进行比较，得对两个作家都有详细的了解，都有独立的思考和研究。我现代文学的知识和功力都不足以支持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就搁手不干了。所欣喜的是，从80年代初至今，已有为数不少的这样的学术著作出版。这些著作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那时极其粗略的比较研究的水平。李继凯先生的这部《鲁迅和茅盾》就是这诸多研究著作中的一部。

李继凯先生我是早就认识的。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我能够保证这部学

鲁迅与茅盾

术著作的严肃性和严谨性。李继凯先生是个很认真、很扎实的人，他对鲁迅和茅盾都曾做过长期的研究。他的这部著作绝不是急就章。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有这种严肃的态度、认真的精神，就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至于其中有无可商榷的地方，有无这样那样的瑕疵，那是人们读后的事情。因为天底下是没有完美无瑕的事物的。

2000年6月2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目 录

面对大师	(1)
乡土之育	(21)
弄潮儿	(47)
文化姿态	(68)
遭受批判	(112)
同一目标	(139)
主体的重建	(174)
文体的选择	(210)
交友与婚恋	(233)
相知的评论	(283)
晚年与身后	(307)
主要参考文献	(342)
后记	(346)

面 对 大 师

名人在历史视境中仿佛是会变形、变色的，这并非在少数人看来是如此。比如鲁迅与茅盾在自己的历史上，也曾经是相当普通的无名的少年儿童，甚至也都有摆脱不了的失去父亲与家道中衰这样纯粹“私人化”的悲哀，但他们的不懈追求与历史机遇的慷慨馈赠，使他们有幸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并相继成为真正“重量级”的大作家，然而关于他们的激烈的争论或悬殊的评价也总是存在的。奇特的是，就在大陆曾经竭力将鲁迅“神圣化”、将茅盾“伟大化”的时候，在海外虽有截然不同的别样的扭曲与恣意的贬低，却也有一些直接相关的比较实事求是的学术性研究。来自海外的声音在相宜的时候对大陆学界产生了积极与消极同在的双重影响。如今，情形似有大变，在不少人那里鲁迅与茅盾都成了“拜拜”再见的对象了，甚至在浑身“后现代”味的人那里，还要莫名其妙地骂上几声。岂

不知就在他们刻意地“耍酷”、“潇洒”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从人生高层次来看，鲁迅才是“真的好酷！”茅盾才是“真的潇洒！”尽管鲁迅有时也很温情，茅盾有时也很世俗。事实上，在更多人的感觉中，鲁迅并没有远去，他就真实地活在人们的心中，但已经不再是涂满红色釉彩的神像，甚至也不单纯是作家或战士，而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故事很多的人，一个让人景仰也让人亲近的人，一个性格丰富而又复杂的让人说不清道不完的文化名人；茅盾呢，情形与此有些类似，真诚地怀念他、研究他的人也自会在心中衡量出他的轻重，他的风度、气质真的是倜傥风流、儒雅大方，远非一般追奇逐怪而又自命不凡者所能企及。但较之于过早去世的鲁迅，茅盾及其代表作（如《子夜》）的理性特征，尤其是其为官的晚年经历似乎招致了较多的指责和批评，好像他的贴近时代的思考和高寿居然为他加多了耻辱，由此使他在有些人的印象中，已不再像鲁迅那样依然是英杰文豪，他的鼻梁上被意外地抹了不少白粉，俨然有些类乎丑角了。倘若真的如此，这两位生前结缘很深的现实主义作家，倒仿佛成了相对立的人物，一个重于泰山，一个却轻如鸿毛了。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如果让我简洁地回答，这就是：鲁迅是中国 20 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巨人，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伟大的思想家的相当完美的结合；茅盾也当得起中国 20 世纪杰出的文化巨匠，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重要的政治家相当完美的结合。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文学大师”而非“文学小师”，更非“文学劣师”，都有着相当大的世界性影响。即使他们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或不足，也实难遮蔽其应有的光辉，也足可引为今人与后人的镜鉴。而他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上产生的种种影响，客观上也已形成相当

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从主导方面看也已成为后人应予珍惜的思想文化资源。将鲁迅及鲁迅研究、茅盾及茅盾研究视为文化性存在，名之为“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成立的；作为思想文化的资源，“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都很值得探讨，其价值与意义也是不宜轻估的。

二

尽管近些年有人在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重新排什么座次，但人们通常还是在文学史上将鲁迅、郭沫若和茅盾并提的，所谓“鲁、郭、茅”是也。就仿佛人们说惯了政坛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那样。“三大家”之说毕竟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尽管有人执意要改变这种“格局”，但从“历史”存在的真实情况看，这种现代文坛“三大家”的称谓，也如政坛“三领袖”的称谓一样，是“历史”形成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在文学“接受史”的意义上，尤其是在某些人的接受过程中，却会发生调整或变形。但无论如何，鲁迅与茅盾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两位作家，特别是以现实主义创作名世的广有影响的两位作家。鲁迅被有的伟人称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以一人之身而显示了“三大家”整合的分量；茅盾也被不少人视为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与伟大的理论批评家，誉之者也是不遗余力的。但这些“定论”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与挑战。

不过要让我说对鲁迅与茅盾总的印象，这就是我在上面给出的“简

洁”的“回答”。不知是不是由于人们对“文革”极其反感的缘故，当今社会是不太喜欢“伟大”这类词汇的，对原来被称为“伟大”的人和事，大多开始怀疑起来。我静心想了想，觉得所谓“伟大”者其实也是相对而言的，而起码的历史事实更是无法否定的。不是有很普通的良母表达了母爱就被称为“伟大的母亲”吗？不是有人因为偶然事故中的勇于牺牲的行为就被称为“伟大的英雄”吗？不是有人唱了些流行歌曲就被尊为“伟大的天王”了吗？所以称鲁迅与茅盾是“伟大的文学家”自然也是可以的，某些人实在没有必要产生那么多的不满，何况这后者似乎严肃得多。我注意到，即使是那种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之类的游戏方式将茅盾逐出文学文类（如小说、散文等）大师行列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茅盾在文学理论、批评、创作和领导等几乎各方面都影响巨大，如果总体上排‘文学大师’，他是鲜有匹敌的，第二位置应当之无愧……”^①，不仅承认茅盾是“文学大师”，而且还被放在第二位呢！可见本欲将茅盾大加贬低甚至扫地出门的人，也不得不在“多项全能”的名义下，仍给茅盾留个重要的位置。不过，在小说、散文（包括杂文）等具体文体创作的“大师”行列中踪迹全无的人，居然也会被普遍视为文学大师么？这实际是那些看似“游戏”而实有些“狡猾”的人留下的并不简单的问题。近期报载《文学界话说王朔金庸》^②一文，其中介绍了吴亮的高见：“国内好多人捧金庸，是打鬼借钟馗，比如王一川是用金庸打茅盾，打击了一大片，这是武林中的宗派斗争。”噢，原来如此！可见问题确实非同小可，是值得注意的。

① 王一川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上，引语《小说中国》，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② 赵晋华文，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1日。

这样的排座次居然也带有“派”的味道，其实也有“冷落当官的”之类的动机，与“精英意识”和“民间立场”都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也与外国（特别是西方）人的看法密切相关。有的人已经习惯以“老外”的态度为态度，要看着“洋大人”的眼色行事，其殖民主义文化心态也必然会影响到对中国作家的评论。在这样的人看来，20世纪是西方的世纪，西方即代表着“世界”，其流行的价值观仿佛也就成了惟一的尺度。衡量中国作家是否为文学大师也要看“老外”的态度。于是就要将学舌的结果体现在重排什么“座次”上了。现在问题还不在于要不要反思文学史和那些“座次”，而在于以怎样的态度（如严肃的还是游戏的，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等的）去反思和研究。不是更有人要好好“后现代”一下，“逮谁灭谁”，彻底“清理”一下鲁迅与茅盾吗？啊，“逮谁灭谁”，多么“后现代”！“贼酷贼酷”！

我真怀疑，历史终究要“清理”掉的不知道是谁。

在大陆教育界、文化界，从50年代起就以革命的神圣名义相当正规地将鲁迅与茅盾视为必读必学的作家。不仅如此，随着“意识形态”神圣化的深入和“舆论一律”纯洁化的加速，已逝世多年的鲁迅和头衔增多的茅盾似乎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他们在成为“旗帜”的同时也几乎成了新时代的偶像。我是于50年代中期降生在这块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而又红旗飘飘的土地上的，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呼吸着这里特有的空气，习惯于眼前飘扬的旗帜和矗立的偶像，久而久之我所习得的话语也便好像只有对旗帜和偶像的赞美。学生时代的作文流于口号化概念化便是个明证。在那样的教育模式下对鲁迅和茅盾的接受，仿佛也多是“误读”。然而，原来似乎纯度很高的空气却几乎窒息了精神的生长，扼杀了人们正常的感觉和想像，倒是80年代以来的渐被“污染”的空气比较宜于恢复活人的敏锐的

感官和丰富的思力。也正是由于空气的转换和人们自身的变化，鲁迅与茅盾的形象以及他们的作品仿佛在接受过程中有了不断的刷新。这好像是特别奇怪的事情。难道过去我们的眼睛出了毛病？难道我们识文断字的能力却导致了一连串的误读？同时在过去习惯的视境中，鲁迅是特别巨大的存在，其“阴影”所庇的效应是只见鲁迅而难得看到其他作家的独立的存在。即使像茅盾这样的大作家，也仿佛只是在与鲁迅保持一致的时候才显示了进步的意义。而以鲁迅划线的结果更是造成了贬损、批判那些与鲁迅不一致的作家的武断。其趋于极端化的结果便出现了“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的奇观。连茅盾积极参与和影响下的中国都市文学和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也似乎找不到了自己存在的位置。好不奇怪，在“研究研究”成为政治话语而非学术话语的时代，所谓鲁迅“研究”和茅盾“研究”不是成了畸形政治的工具就是被弃若敝屣，迄今思之犹让人哭笑不得、莫名其妙，抑或痛心疾首而又感慨万千。在这个意义上，不幸的又何止于“研究”鲁迅与茅盾的人呢？老实说，这样改装或扭曲了的“鲁迅与茅盾”以及相应的所谓“研究”，也的确需要“清理清理”。但这“清理”也不是完全抛弃，不仅要披沙拣金，而且要尽可能废物利用。

幸而 20 世纪的中国有了“新时期”，一个真正的历史新时期。正是这新时期接续上了自近代以来便萌发的立人立国的现代化之梦。一切价值都要重新予以评估，五四时代的强音再度响彻云霄，透入人们的心底。鲁迅研究和茅盾研究也迎来了各自的“新时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不是可以轻易“清理”掉的学术成果。

三

仅仅就我个人的阅历或见闻而言，我就非常感动于那些对鲁迅研究和茅盾研究奉献了心血的人们。由此我想在这里特别提起我的几位倾注心血于“鲁学”的老师（此时我的心底涌动着对他们的感念和思念）：一位是黎风先生，他是我的恩师，正是他出的考试科目“鲁迅作品研究”使我成了他的研究生。他原是李何林、钟敬文等先生的学生，建国初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不久却因胡风问题的“牵连”而发配大西北。从此受到了种种生活的磨难，身心健康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但他却坚贞地保持着对鲁迅的热爱，并通过教学和自己的言行将这种热爱像种子一样播撒开去。同时他也在艰苦清贫的情况下，以病弱而又刚强的生命写下了一些研究鲁迅的论文和著作《鲁迅小说艺术讲话》等。这些都曾深深地感动着我和他的其他学生。比如段国超学长在他的《鲁迅家世》的再版后记中说：“我的大学老师、有影响的鲁迅研究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黎风先生，已年近八旬，一直在关心我对鲁迅家世的研究。……不顾年迈病重，手抖写字不便，又赶写序言寄我，令我感喟不已。”哀哉！就在写毕此序不久，黎风师又住进了医院，挨过数月，终于病逝。有人赋诗曰“惜被胡风累半生”，余则曰“幸有鲁迅益平生”。另一位是陈金淦先生。在我的经历中，大学时的老师陈金淦先生，在讲台上非常认真地讲鲁迅，还开设了鲁迅研究的选修课；在讲台下，为了研究鲁迅经常废寝忘食，那时才刚刚从“文革”中走出，又身在一般师范院校，研究条件相当差，但他却克服着常人难以想像